

中国共产党史稿

第二分册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



人民出版社



2 023 3403 6

中国共产党史稿

(第二分册)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

人民出版社

中国 共产党史稿

(第二分册)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250×1168毫米 32开本 8.75印张 210,000字
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70,000

书号 11001·499 定价 1.00元

只限国内发行

目 录

第 三 编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九三七年七月)

第七章	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创建工农红军和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	1
第一节	北伐战争失败后的国内政治形势。八一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的八七会议	1
第二节	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广州起义与各地武装起义。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出现及基本结束	16
第三节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毛泽东论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33
第四节	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取消主义的彻底破产	43
第八章	工农红军的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	53
第一节	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古田会议。毛泽东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53
第二节	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67
第三节	土地革命的深入	77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的白区工作的恢复和发展。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	92
第五节	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毛泽东关于中国工农红军的基本作战原则的形成	105
第九章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卖国内战政策	122

第一节	三十年代初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出现·····	122
第二节	“九一八”事变。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和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兴起。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白区工作的危害·····	133
第三节	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查田运动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发展·····	143
第四节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苏区和红军的危害。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156
第十章	中国共产党的遵义会议。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168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遵义会议。中央红军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168
第二节	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长征的伟大胜利·····	179
第三节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197
第四节	白区文化战线反“围剿”的斗争·····	203
第十一章	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213
第一节	华北事变。一二九运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	213
第二节	瓦窑堡会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	225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红军的东征·····	232
第四节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内和平的初步实现·····	245
第五节	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252
第六节	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	261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小结·····	277

第三编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九三七年七月)

第七章

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创建工农红军和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

第一节 北伐战争失败后的国内政治形势。八一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的八七会议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错综复杂的重大变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建立了反共反人民的新军阀统治。民族资产阶级则为人民大革命所吓倒而附和了新军阀的反动统治。许多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在这个历史的紧急关头，也纷纷退出革命。继续进行革命的只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贫苦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中国革命由高潮暂时转入了低潮。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和乡村豪绅地主的统治。新军阀的阶级实质与旧军阀是相同的，他们之间

的差别在于新军阀比旧军阀更富于欺骗性、买办性和残酷性。新军阀曾经在革命的旗帜下和旧军阀打过仗，在群众中有过一些影响。他们叛变革命以后，在一定的时间内仍在利用这种影响，进行反革命的欺骗，以配合其血腥的军事恐怖；国民党曾经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新军阀盗用了这个党的名义，大肆招摇撞骗，大干反革命的勾当，而旧军阀则没有这种反革命的资本。新军阀对外投降卖国，比旧军阀具有更大的买办性。他们在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建立了以黄埔系反动军官为骨干的反革命军队，这支军队无论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远远超过旧军阀的任何一支反革命军队；同时，他们还建立一套庞大的全国性的特务组织，这也是旧军阀所望尘莫及的。他们依靠这些反革命资本，更加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广大工农群众，实行其反革命统治。

一九二七年八月，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反革命统治后不久，由于其内部的派系斗争，他曾一度下野。但是，在上海金融买办集团的策动和支持下，他变本加厉地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一九二七年十月，蒋介石访问日本时，公开向日本帝国主义求援，在承认日本对我国东北有“特殊利益”的条件下，取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同年十一月，他又通过英美买办宋子文等与英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他在得到帝国主义的进一步支持后，便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回到南京重新上台。这时，他立即以实际行动表示他对帝国主义的忠诚。一九二八年四月，他向在北伐战争中炮击南京、镇压中国革命的英美帝国主义者表示歉意，赔偿损失，并下令通缉在南京领导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共产党员林伯渠，替帝国主义“惩办凶手”。五月三日，日军侵占济南，杀伤中国军民一万余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日浪潮。但是，蒋介石为求得日本帝国主义的“谅解”，却无耻地训令国民党军队不得抵抗，公然声称“对于日本人，绝对不开枪”，“为救一日人，虽杀十人亦可”。

由于蒋介石政府的投降卖国，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势力迅速扩张起来。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投资从一九一四年的二十二亿五千五百六十余万美元，增长为一九三〇年的三十四亿八千七百五十余万美元^①。对华商品输出的增长更为惊人，中国入超指数如以一九二六年为一百，一九三〇年则为一百五十九点六，一九三二年则为二百一十四点一，比一九二六年增加百分之一百一十四点一^②，造成中国贸易史上的最高纪录。帝国主义国家从中国人民身上榨取的高额利润也不断增长，根据它们自己的报告，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间，英商汇丰银行股东所分得的股红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一九二九年怡和纱厂分红达百分之四十。一九三〇年在华美商的利润一般为百分之十至二十五，有的高达百分之五十或百分之三百^③。

国民党新军阀是由各派军阀合流而成的。蒋介石除了拥有他的嫡系部队之外，在南方，接纳了粤系军阀和桂系军阀，改编了吴佩孚、孙传芳倒戈和溃散的军队；在北方，收容了阎锡山和冯玉祥部，又于一九二八年底把奉系军阀拉入他的反动营垒。

在新军阀的统治下，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矛盾，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和频繁不息的军阀混战。国民党内，有蒋介石所代表的南京国民党，有汪精卫的改组派，有张继的西山会议派，还有胡汉民派以及广东派、广西派，等等，他们激烈地争夺所谓国民党的正统和地盘。为此，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〇年的三年之内，先后爆发了六次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即：一九二七年十月，蒋介石、李宗仁同武汉汪精卫、唐生智的战争；同年十二

①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52 页。

② 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史教研室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147 页。

③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80—81 页。

月，蒋介石同粤系军阀争夺广东的战争；一九二八年四、五月间，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战争；一九二九年三月，蒋介石同广西军阀争夺华中的战争；同年八月，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一九三〇年四月，蒋介石同冯、阎的第二次中原大战。此外，还有各地小军阀之间不断的战争。据估计，在这些战乱中，约有五十万人战死，无数人民颠沛流离，家破人亡，这种惨状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罕见的。经过这些战争，蒋介石虽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他的反革命统治，但是，这个统治的基础是脆弱的，各派军阀之间的尔虞我诈，明争暗斗依然存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①这种分裂和战争，削弱了反动统治，为革命力量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下，工人阶级处于政治上毫无权利、经济上毫无保障的地位。原来曾经拥有三百余万会员的各地工会被解散、被封闭，工人领袖和积极分子百分之八十被开除、被迫害。根据一九二九年二月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次扩大会议的报告，在豫、湘、鄂等省的工厂，均有反动军队驻扎，工人稍有反抗，即惨遭武力镇压。上海巡捕可以随时进厂捕人，并加以“反革命”或“共产党”等罪名，恣意杀害或监禁。工厂遍设包探和反动工会头目，以监视和控制工人群众。在经济上，工人生活日益贫困。工时延长了，工人的劳动时间一般都恢复到十小时以上，纺织厂工人竟增加到十二小时至十六小时，甚至连革命时期争得的饭后半小时休息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劳动强度提高了，上海纱厂一个工人由管理一、二部机器增加到管理三、四部机器。工资大幅度下降，上海各业工人

^①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47—48页。

的工资都大量减少，武汉工人有百分之八十降低了工资，广州油业工人的工资连减三次，北方铁路当局拖欠工人工资几个月到十几个月^①。劳动条件日益恶化，失业者遍及各大城镇，到一九二九年初达五十万人^②。

在新军阀的统治下，农民的处境更加悲惨。革命时期被打倒的豪绅地主，疯狂地向农民反攻倒算，解散农民协会，捕杀农民领袖和积极分子。减租减息转为加租加息，土地日益集中在地主豪绅手里。苛捐杂税越来越多，如一九三〇年河南商城田赋附加税超过正税百分之六百，四川奉节超过百分之七百六十八，山东齐东超过百分之七百三十七。一九三一年湖南永兴、临武等县附加税超过正税百分之四百六十二到五百四十二。一九三三年江苏各县附加税超过正税有数倍者，有十余倍者，甚至有二十六倍者，实属骇人听闻^③。新军阀勒索人民而来的租税，除中饱私囊以供其任意挥霍外，大部用于军阀混战和“围剿”红军。由于国民党新军阀的残酷压迫和横征暴敛，由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间的严重自然灾害，灾民每年竟达四、五千万人之多^④。农村有劳动能力者大量减少，荒地不断扩大，农业生产日益萎缩，广大农村出现了饿殍遍野，一片凄惨的景象。

在新军阀的统治下，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处境每况愈下，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负担大大增加。据记载，南京织缎业如以一九二八年生产指数为一百，一九三二年则降为百分之三十三点四七^⑤。河

① 项英：《过去一年来职工运动的形势和目前的总任务》，1929年2月。见《中国工人历史文献》（2），工人出版社1958年版第153页。

② 《中华全国总工会扩大会议告工友书》，1929年2月。同上，第251页。

③ 参阅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7—19页。

④ 参阅陈晖：《一九三三年的中国农业灾荒》，1934年3月8日。见《中国经济论文集》，第204页。

⑤ 参阅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三卷，第427页。

北高阳一九二九年有布机三万三千八百架，一九三三年则减少到一万二千六百架^①。土布的停机已成普遍现象，苏缎的销路也一落千丈。然而，各种赋税却扶摇直上。例如，一九三一年在苏、皖、浙、鄂等省所征收的营业税，比一九二五年超过三倍至十一倍以上^②。其他苛捐杂税则名目繁多，无法计算。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营业受到摧残，大大加速了他们破产的过程。至于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则不但毫无民主权利，而且大批失学、失业，许多人流落街头，徬徨无依。

在新军阀的统治下，追随蒋介石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他们在外资外商大量入侵的打击下，逐步陷于破产和半破产的境地。据国民党政府实业部统计，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三年历年注册的厂数和资本额，总的趋势是在逐年下降，而资本额下降趋势尤为严重。如以一九二八年的注册厂数和资本额均为一百，一九三二年注册厂数则降为三十四点八，资本额则降为十二点四^③。如将新厂的设立和原有工厂的改组、歇闭联系起来考察，以上海为例，一九三四年新设工厂二十八家，但由于“市面萧条，发生亏蚀”或“财政周转不灵”等原因而改组的二百九十一家，歇闭的七十家^④，新设抵不上歇闭。这样大量的工厂的改组和歇闭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至于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极少数人从新军阀那里分得一官半职，那不过是充当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装饰品而已。

在新军阀的统治下，中国共产党及其他革命力量遭到了极大的摧残。据极不完整的统计，到一九三二年以前，被屠杀者至少有

① 参阅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第653页。

② 参阅贾士毅著：《民国续财政史》（七），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01—144页。

③④ 参阅汪敬虞：《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民族工业》，见《新建设》1953年第12期。

一百万人，仅一九二八年一月至八月，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即达十万余人。中国共产党一大批优秀的领导人在这期间惨遭杀害，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员人数由大革命时期的近六万人减少到一万余人，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城市工人的罢工斗争，虽然陆续不断，但大多数是自发的、分散的经济斗争。斗争取得胜利的占少数，大多数陷于失败或是没有结果。革命高潮时的工会会员曾经达到三百万人，而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〇年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有组织的工人，只有七万人左右。各地农村虽然不断爆发抗租抗税斗争，有些地方还爆发武装起义，然而这些斗争也是此起彼落，分散而不集中。此时，工农群众的斗争状况表明，全国范围的群众革命高潮已经过去，中国革命暂时转入了低潮。

正如毛泽东所正确指出的，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①“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②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一天天在激化，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中国革命依然迫切地需要“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③

在蒋介石、汪精卫疯狂屠杀革命人民的黑暗日子里，“中国共

①②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47页。

③ 《井冈山的斗争》，同上书第一卷第76页。

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①

汪精卫公开反共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积极领导反击蒋介石、汪精卫的斗争，并将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一部分中央负责干部派往九江，准备组织共产党能够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北伐军重回广东，继续革命。不久，因军事形势急变，敌情紧迫，李立三等一致主张在南昌举行起义，并且征得当时在庐山的瞿秋白的同意。七月二十日后，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常委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等人，采纳九江方面李立三、瞿秋白等的建议，赞同在南昌举行起义，并积极向九江、南昌派遣领导干部。周恩来被任命为共产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前去南昌组织和领导起义工作。

当时敌人在南昌的兵力比较空虚，第五方面军总指挥兼江西省省长朱培德在庐山，其所属第三军主力在吉安，第九军主力在东乡、进贤一带。南昌城内和近郊只有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及警卫团，第三军的第二十三团、二十四团，第六军的第五十七团，第九军的第七十九团、八十团，南昌卫戍司令部和省政府的警卫部队，总计约一万人。而中国共产党能够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则有叶挺指挥的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驻在九江地区；贺龙指挥的第二方面军第二十军，也驻在九江地区；朱德指挥的第五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局的两个保安队，驻在南昌；以铁军独立团为骨干编成的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其所属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及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分别驻在南浔铁路马回岭车站，总计有三万余人。此外，还有卢德铭领导的武昌国民政

^① 《论联合政府》，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85页。

府警卫团和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的学员驻在武汉。总起来说，形势对共产党举行起义十分有利。

当起义部队开始向南昌集中时，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汪精卫、孙科、朱培德等先后窜到庐山和九江，朱培德急忙通知贺龙和叶挺到庐山开会，阴谋趁机解除贺、叶兵权，张发奎并以第二方面军名义严令贺、叶两部集中于德安，企图加以聚歼。这个阴谋为在第四军担任参谋长的叶剑英所察觉，他立即与叶挺、贺龙秘密对策，决定既不去庐山开会，也不理睬集结德安的命令，而将部队直开南昌。七月二十七日，贺龙、叶挺所部开抵南昌。

七月下旬，周恩来肩负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重托，从武汉到达九江，向共产党在九江的中央委员和干部传达了中央常委关于南昌起义的决定，并在军事上作了部署。二十六日，周恩来从九江到达南昌，与朱德共同商讨起义有关事宜。这时，先后到达南昌的还有李立三、刘伯承、彭湃、聂荣臻、恽代英、吴玉章、林伯渠、廖乾五、徐特立等人。二十七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委员有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江西省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也出席了会议。会议详细地讨论了有关起义的一系列问题，决定于七月三十日起义。二十八日，成立了南昌起义总指挥部。

起义的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的时候，七月二十七日，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从武汉赶到九江，企图阻挠南昌起义。当他对象起义表示怀疑时，立即遭到当时在九江的恽代英、贺昌、廖乾五等人的反对。二十九日，张国焘两次电告前敌委员会说：“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我到再决定”。三十日晨，张国焘到达南昌，他在前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仍坚持己见，说什么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起义，否则不可动；又说，根据目前形势应根力拉拢张发奎，起义要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张国焘这种实际上取消南昌起义的错误主

张，遭到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谭平山等的坚决反对。周恩来明确指出张国焘的主张与中共中央的精神不符，起义绝不能推迟，更不可停止。张国焘反对起义的主张被否定，但是，由于张的干扰，原定于三十日起义的计划被推迟。三十一日晨，前委继续开会，张国焘又要亲自修改起义后的宣言，妄图借以拖延时间，阻挠起义。他这种破坏起义的阴谋，再一次遭到周恩来等的反对。会议最后决定八月一日四时举行起义。

会后，前委立即进行起义前的直接准备，分别向团以上干部传达了关于起义的决定，发布了起义的命令，使各团、营明确了战斗任务和起义的有关规定。此时，贺龙突然发现二十军一副营长向敌人告密，他迅即向前委作了报告。前敌委员会当机立断，决定从三十一日晚九时开始全城戒严，并把起义时间提前两小时。

八月一日晨二时，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的直接指挥下，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爆发了。因事先布置周密，仅仅经过五个小时的战斗就全歼敌军。起义胜利后，红旗在总指挥部大楼高高升起，南昌城内一片欢腾。当天上午，前委派聂荣臻到马回岭车站部署二十五师起义。中午，该师大部举行起义，在德安歼灭敌追击部队。八月二日，该师开到南昌，与主力会师。接着，在周恩来主持下，起义部队进行了整编。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名义，由贺龙任代理总指挥，叶挺任代理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兼，党代表廖乾五；第十一军军长叶挺兼，党代表聂荣臻；第九军副军长为朱德。原在武汉的国民政府警卫团，因途中受敌阻挠，没有赶上起义，折回修水、铜鼓一带，后来成为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骨干力量。军校学员从武汉抵达九江时，被张发奎截留，未能参加起义，并被编为第四军教导团，南下广州。后来，这支队伍成为共产党领导广州起义的骨干力量。

南昌起义胜利后，立即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这个宣言，是国共合作时期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共同署名发表的。宣言义正词严地揭露蒋介石、汪精卫的一系列叛变行为，指出南京和武汉的国民党党部与政府，“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按：指孙中山）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宣言并提出七项主张，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共同努力，为获得一个新根据地，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一切新旧军阀而斗争。八月一日上午，召开了以共产党员为主体、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选举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由宋庆龄、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谭平山、恽代英、李立三、张国焘、郭沫若、吴玉章、徐特立、林伯渠、彭湃、邓演达、何香凝、彭泽民、张曙时等二十五人组成（宋、邓、何均未到南昌）。八月二日，联席会议发表宣言，明确宣布要继承北伐革命没有完成的事业，反对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会议还发布了通缉蒋介石、汪精卫的命令。二日下午，革命委员会举行就职典礼，到会各界群众达数万人，“旌旗蔽日，欢声震天”，盛况空前。这个“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实质上是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并联合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民主革命政权。它的成立，对蒋介石、汪精卫所代表的国内外反动势力是一个沉重打击，对广大革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也是一个有力的批判。

南昌起义的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派的各个集团大为震惊。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都立即调兵遣将“讨伐”起义军。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八月三日至六日，起义军先后撤离南昌，取道临川、宜黄、广昌南下，计划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八月二十七日，南下部队击破江西壬田之敌，进占瑞金。三十日，起义军又攻克会昌，大破蒋之嫡系钱大钧部，毙伤敌人甚多，俘敌官兵九百

余人，缴获各种枪枝一千余枝，还有其他许多军用物资，这是南昌起义军南进途中的一个大胜仗。

九月十日，起义军到达长汀，前委再次讨论了攻取东江的计划，决定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部队于三河坝，监视梅县之敌，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十八日，起义部队通过闽粤边界，出敌不意地占领了大埔、松口、三河坝地区，随后即分兵，由朱德率第九军教导团和第二十五师留守三河坝，总指挥部率主力继续向潮州、汕头前进。九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起义部队分别占领潮汕后，前委又决定分兵，以第二十军第三师率两个团和政治保卫处警卫团留守潮汕，参谋团率第一师、第二师、第二十四师继续西进，攻取惠州。

此时，两广军阀李济深、黄绍竑调集重兵，对起义军西进部队以及留守在潮汕和三河坝地区的部队，分别发起进攻。西进部队由于粮弹不足，敌众（近二万人）我寡（约六千人），终于在汤坑一战失利，后撤向揭阳。十月三日，该军进至普宁县之流沙镇，与前委首脑机关会合后再至乌石。此战虽毙敌三千，但起义军伤亡也近两千。汕头起义军在击退敌人后，西进乌石，与主力会合。十月三日，该军又在乌石遭敌突然袭击，经激战，一部分冲出重围，进入海陆丰地区，与当地的农民起义武装相结合。潮州起义军英勇抗击敌之进攻后，四五百人突围到饶平。三河坝起义军在朱德、陈毅指挥下经三昼夜激战，打退敌三师之众的多次进攻，但付出很大代价。十月三日，该军胜利突围，在饶平附近与潮州突围的部队会合，沿途又收容了一些零散人员，总计约二千五百人，迅速退出广东进入湘粤赣边开展游击战争，一九二八年一月从粤北进入湘南地区。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武装力量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它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为全国人民树立了一面鲜明的